

■蜜蜂寓言

# 你的信息基础决定你的判断

◎苏小和

财经作家,现居北京

许多观点放在一个狭窄的信息范围内看,应该说都是正确的,但若把信息范围拉开,则很能看到其不足之处。唯有扩大信息基础,才能确保观点的提出建立在更广泛的信息基础上。我们得时时小心,限于信息环境,我们的观点很可能是片面的。在现实生活中,信息的范围无限外延,其限制则无所不在。所以,如阿马蒂亚·森所言,考察这些观点的信息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数据,就成为我们的必要功课。

近日细读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森对三种价值观的比较性分析以及他的阶段性结论意见让我豁然:每种派别的长处和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考察其信息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来理解”。森强调了扩大信息基础的重要性,这种强调很对我此时的心态。前段时间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小心翼翼说出观点,当时的出发点即是对自己信息的怀疑:以我们目前的信息环境,我们的观点很有可能是片面的,无效的。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啊。我的朋友叶,来自台湾某商学院,他在市场营销方面有自己的教学体系。今年2月份应我的邀请,参加一次企业家沙龙,在听取大陆一群学者和企业家大谈商业文明,大谈宪政建设之后,他说,我完全不能想象,一群企业家竟然在这么好的沙龙里谈论政治,谈论文明这样虚幻的东西,今天的台湾企业家在一起谈论的,永远都是利润,是如何赚取利润的方法。”

北京大学的朱教授,在给学生讲述企业如何完成私募的时候,话题带到了今天的大学校长应该怎样定位。朱教授的结论很简单:大学校长是干什么的?

他是为这所大学到处找钱的。”

杨鹏是内地研究中国政治生态比较有想法的专家,他提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公共产品的缺失,这样的观点让我心仪。他偶尔会读一读我写的本土企业模式案例。见面来,杨先生说,你观察并写作的本土企业商业模式价值不大,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没有解决商业文明理性建设的前提下,更是没有价值,中国企业哪有模式可谈?”

同样来自台湾,《全球商业经典》的管理人费先生在一次关于媒体使命与责任的沟通会上说:我知道大陆的媒体朋友向往新闻自由,但我提醒你,台湾开放报禁之后,这些年来引来了一大批媒体的死亡,媒体作为一个产业,它所发生的变化几乎让人接受不了。所以我劝大陆的媒体朋友多思考一些媒体定位、市场细分、受众接受,这些技术性话题,是媒体能不能活下去的重要问题。”

上述观点放在一个狭窄的信息范围内,应该说都正确,但把信息范围拉开,则很能看到其不足之处。现实中,信息的范围无限外延,其限制则无所不在。如同森所言,考察这些观点的信息

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数据,就成为我们的必要功课。叶教授的信息数据哪里出了问题?我想他是用目前的信息数据掩盖了他过去曾经储存的信息数据。人都是容易健忘的,我想叶教授也不例外,他把台湾过去发生的历史信息丢到回收站里了。

金融学教授的信息渠道主要来自他的专业,这种与众不同的长处经常会得到企业的回报,如此,他便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信息数据放大并复制到了其他领域。我听了他的观点以后,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蔡元培先生还活着,你认为他会认同你的观点吗?

杨鹏的信息数据有局限吗?他对我的工作否定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经常生出工作虚妄之感。但杨的方法在这里仍然扩大了他个人数据的价值,并用他的信息体系轻率地覆盖了我的信息体系。很多批评性工作可能都在沿用杨鹏的范式,并且这种范式的强权性非常隐蔽,隐蔽到连彻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意识不到。

费的信息支持我想应该来自于一家媒体的经营范围。媒体是经营单位,是企业,这是常识,但媒体是公器,也应该是常识。这就是做一个媒体人的难处啊。曾经听说有人谴责默多克在东亚的投资放弃了信息自由的底线,主动迎合强权的信息限制,而默多克对此不屑一谈,他说在他的企业里,他有处理信息的自由。

看一下森对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公平主义的比较性分析吧,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信息处境。功利主义的价值标准是:所有人的



我们得时时小心,限于信息环境,我们的观点很可能是片面的。

最大效用或者福利。按照人类的基本体验,所谓效用和福利,是一种幸福和痛苦的心理状态。问题就在这里,如何测度一个人心理状态的水平?如何进行人与人之间比较?如何将所有人的效用福利计算成整个社会的效用和福利?一旦我们将功利主义的标准当成真理,那将找不到准确的信息基础,随之就会陷入一种模糊的情感状态,并用这种情感状态来决定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经济学行为。

自由至上主义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他们的价值标准是:有法治权利保证

的,受最少限制的个人自由。森认为,这样的标准显得信息基础不足,它的要求是程序性的,而程序先于后果,甚至不考虑后果。人们的价值观多半是强调后果。这种对数据的莫衷一是,必然导致人们对自由至上主义的理解和执行的莫衷一是。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公平主义强调立足于公平的一套优越于任何其他考量的自由权。问题是,信息数据是外延且不断变更的,绝对的将公平主义优先于其他事物,等于事先排除了影响全面价值评价的多元元素,把一个多元的世

界强行定位了几元或者单元了。

面对这样宽阔的思辨过程和比较过程,尤其面对当下有些捉襟见肘的信息局面,我们应该怎么办?森的建议是,扩大信息基础,确保观点的提出建立在更广泛的信息基础上,并有意识地审视属于自己的信息限制。对于我这样生活在汉语文化之下的中国人来讲,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奢侈的建议。多少年以来,一直存在一个巨大的力量,人为地限制我们的信息基础,我有什么等力量,通过什么手段来维护自己与生俱来的信息基础呢?

■买房者说

## 是是非非“第二套”

◎章剑锋

厦门大学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香港财经文摘杂志高级记者,专栏作者

尘埃一旦被掀起,便不能轻易落定。金融监管层对“第二套”住房提高贷款首付比例的强硬规定,把“第二套”这个词的盖子揭开,触碰了一些不明是非的人的神经。于是,气势汹汹的意见接连出炉。

有人认为不应该允许中国人拥有第二套住房,端出来的理由又不免老套,说中国是人口大国,相对土地资源贫乏,人人拥有“第二套”,会侵犯别人的生存权、是对环境的破坏、对子孙后代的犯罪。

我不得不说,这是不均等的利益流向所致,它使得各怀私利的集团站出来相互指责。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获利多相互利益集团对另一个得利颇多的利益集团的成见。一种隐讳、真实而又浅显的原因显然应该是这样:觉得别人购买的房子多了,对自己房子少的窘境造成挑衅、威胁到做人尊严,心里酸溜溜,因此强调不公平也不公正,要求对房子多的人加以制约,最好来一次清算。

据我所知,这种言之凿凿的论调有一多半是在强词夺理。假使人人都拥有“第二套”住房,本来是皆大欢喜的均衡,怎么会侵犯别人的生存权并造成一系列后果?反过再来问:假使一套住房是公正的,那么请问,有那么多的同胞,拖家带口挤住在“一套”勉强可以遮避风雨、面积狭小的房子里面,是否也算得上公正?是否也理应立即去限制他们购买“第二套”住房来稍微改善一下居住环境?

不要忽略深层次的社会现实,居住分化状况当前如此严峻。此时此刻,有多少人需要通过必要的“第二套”来改善居住质量?这个问题是那些出于嫉妒本能而希望操纵“第二套”禁止令泄恨的人所不能回答的。他们从来只注重数量上的公正与公平,对于更为实质的居住质量与居住内容的不公正、不公平,一向视而不见。

说完困难户,再说到非住房困难户,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去限制他们购买“第二套”。无端去禁止,这恐怕有悖常情。那些不炒房也不投机的人想要再买一套房子,显然不应受到歧视。如果进入市场消费也算触犯道德和犯罪,很难说我们能不能有把握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系。因为目前我们已经陷入一种困惑:市场经济不允许投机倒把,不纵容炒作犯罪,难道连购买多一点商品的自由也不允许吗?

的确,此时有人又可以出来不厌其烦地陈述,中国是人口大国,土地资源贫乏,人人拥有“第二套”,侵犯的是别人的生存权等诸此种种。这样的理由如此冠冕堂皇,却必定会贻笑大方。诚然,因为人口众多,土地稀缺,所以要照顾别人的生存权、照顾环境和子孙后代,所以理应对“第二套”进行限制。可是如果依照这样的逻辑,人人拥有一套“房子”就不是在侵犯别人的生存权、不是对环境的破坏和对子孙后代的犯罪吗?有什么科学论据说明,拥有“第二套”是违反标准的,有悖情理的,而拥有“一套”却是符合标准的,有情理的?是不会导致一系列问题与后果的?

通过大力限制乃至禁止“第二套”住房的主张,我们能够毫不费力地发现某种可怕的直线思维。正如穷苦的人们认为自己的不富有是因为别人的富有所致、自己的幸福感的丧失是因为别人拥有了幸福感一样,由此寻求抹平,要么一样富有,要么一样贫穷。如出一辙的是,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只有一套房子,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又是基于别人拥有两套时,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也很干脆,他会间接摊牌,要求别人也不能拥有两套。

事实上,我并不悲观地认为,当大多数人拥有两套住房的时候,会产生任何不利后果。与此相反,我主张鼓励人们向往第二套。生活总是需要一点希望的,没有追求的生活将是一潭死水。为什么不提倡一种美好的憧憬呢?允许有追求,第二套也不是问题。现实在于,还是让我们先想办法从让人们都拥有第一套住房开始吧。

没有理由不乐观地预见,当人人拥有第二套,必是上一代人在造福下一代人。上一代人享有“第二套”,居有其所,拥有了完整的居住权益,到下一代人手里,这种完整性依旧会被完整继承下去。住房资源和空间不仅在上一代人那里不会被带走或毁灭,因为传统的承袭,反而能惠及两代甚至更多代人。

至于说到透支土地,显然也是一种荒谬而不懂变通的说法。请不要把我们自身的低能推及到子孙后代身上,认为他们也只会和我们这代人一样,靠倒卖土地来换取短暂繁荣。这是一种毫无创见的推理。即使是卖地生财求取发展,这发展的成果——社会财富——最终仍然是会流到子孙身上去由他们享有,岂不闻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惠及的仍然是后人。

■边上人语

## 孩子少了,猫狗多了

——也说人口多寡与一国生活贫富之关系

◎胡飞雪

职业投资人 自由撰稿人 现居河南平顶山市

最近与多年不见的韩女士相遇,她怀里抱一只猫,那猫毛发雪白且有光泽,近之可闻缕缕清香。韩说,唯一的孩子去北京大学读研了,老公是一科长,工作忙,常常每天很晚才回家,电视早已看够看烦,为了打发时间,就养了这只猫。可以说这猫的生活待遇比民工都优裕,三天洗次澡,洗一次用一包洗发水。吃的就更不用说了。我吃啥,它吃啥,鸡鸭鱼肉,家常便饭。住得更好,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我这猫,跟章子怡的宠物狗没法比,人家有专人侍候,但与农村的猫狗比,绝对是小康生活水平,这也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我养猫,没别的目的,只要它陪我消磨时光就行。冲我“喵喵”叫就是给我的最大的奖赏。

韩女士这番话,使我陷入了沉思。我也做了一些社会调查,得出了结论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社会居民家庭中出现的最大的变化之一,

抑或说出现的对比最明显的变化,可以用一“少”一“多”来描述概括,即孩子少了,猫狗多了。”

多少年来,总听人们说,中国太穷,是因为人口太多。一国人口之多少,通常有两个概念标准,一是绝对人口数,二是相对人口数(或称为人口密度)。看绝对人口数,中国无疑世界第一,但看相对人口数,则未必。日本国土面积是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人口是中国的十分之一,看相对人口数,应该说中国人口少于日本。其实不光日本,中国的相对人口也少于印度。从另外一个角度看,1980年之前,中国人口超过8亿,呈现整体性的贫穷状态,现在是13.5亿,却是绝大多数已经脱贫,且有相当一部分达到了小康水平。所以不论横向与日、印比,还是纵向与改革前比,从正反两方面看,一国人口之多少都不是决定贫富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唯一的条

■彼岸

## 换个视角看美国低投票率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专栏作者,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11月的第一个周二是美国的选举日,虽然今年没有大选和中期选举,但美国各地都有选举,在我居住地的选票上没有候选人的名字,有的是一项议案。比如,一项修改州宪法的议案写着:州政府要发行30亿美元债券,将用于防治癌症的研究基金;另一项修改宪法的法案上提出要限制政府对地产生税的征收,每年地产的评估值不能增加10%,诸如此类的议案在选票上列出了20多项。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一些机构在本地的电视和电台做了许多广告,提出支持或反对的意见和理由。比如,一个叫“年轻保守主义者”的组织呼吁选民反对30亿癌症研究债券,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三条:一是私人研究机构远比政府资助下的研究更为有效;二是最终将花费46亿(包括债券的利息);三是州政府应该从该在就有的预算盈余中拿出资金,而不该给纳税人再增加负担。当然,支持的一方也有许多理由,同样在

媒体上大做广告,称癌症研究不仅有救死扶伤的意义,更能帮助把本地建设成世界级的癌症研究基地,对本地的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好处。

选举日那天,我去了投票站,投票的人非常少,根本不用排队,我只用了5分钟时间就在电子投票机上投完了票。我持有小政府的理念,我支持“年轻保守主义者”组织呼吁,如果政府要资助癌症研究,但对政府开支政策持反对意见。次日早上结果公布,60%以上的选票支持那项癌症研究债券,30亿债券发行就通过了。在那项议案上,我是失败者,但我服从民主的决定,虽然不情愿,我也要为此承担债务。

应该说,本次选票上也列出不少重要的议案,但只有8%的选民投票,这就是当今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选

举现实。总统大选也就是60%左右的投票率,地方选举,如果有15%的选民参加,那就是非常不错的参与率了。这些年来,美国许多机构都在非常努力地争取有更多的人参加投票。为什么那么多的选民不去投票?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许多选民并不珍惜他们的选举权,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年轻人也许忘了,在美国民主制度的初期,绝大多数公民并没有选举权,所有公民都拥有选举权是经过长期努力才得到的。

在殖民时期的美国,拥有财产或者向政府纳税的人才有投票权。独立以后,以杰弗逊为首的一群建国者仍然坚持财产下的投票权,如此对投票权的定义来自一个“社会中有份额”的概念,在社会中有份额的人才对社会有责任感,而那些在社会中没有份额的人却可能对社会造成混乱。显而易见,那样的民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是一种财产拥有者的共和体制。在当时,只有部分白人有着那样的投票权,由于财产作为投票的前提,当然利益就提到了相当的高度。的确,当初的那些美国建国者们剥夺了许多人的投票权利,但历史地看,他们是从当时美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他们担心让那些在社会里没有利益和责任的人去投票,也许就不会投出有责任心的选票。

到了1815年,安德列·杰克森(后来也当选为美国总统)发起了大众民主运动,开始了从财产拥有者共和到大众

空间只限于猫狗豢养者家中,不得放之门外,猫狗咬伤他人,豢养者必须高额赔偿被咬伤人的损失。美国《商业周刊》8月的报道说,去年全美花在宠物上的金钱达410亿美元,比十年前增加了十倍,中国目前有多少不拿耗子的玩具猫和不看家护院的宠物狗,它们一年要吃掉多少吨粮食呢?如果仔细统计,恐怕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吧?要知道,50多年来,中国进口粮食的年份是多于出口粮食的年份的,面对这样的国情,还要容忍某些人豢养猫狗,无端地空耗民脂民膏,实属荒唐之极。政府应尽快出台法规,禁之限之,强力约束之,控制它的数量和活动范围。

有一只宠物猫玩具狗,就是有,有两只,就是多。而多一只猫狗,对社会就多一份或直接或潜在的危害,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不是数字大小的问题,而是价值有无的问题。政府机关里的冗员和稻田里的稻草人,犹能糊弄一下不明就里的老外,猫狗何德何能?它们不耕不织,不懂民生,它们多了,实在不是中国的福音。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维持几年,学术界已经有各种推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至今仍少见有分量的、不同观点的研究。孩子越来越少,宠物越来越多的现实,在逼问今天的中国人,我们该有怎样忧患意识?

民主的变革,各州纷纷废除了财产拥有对投票权的限制,虽然更多的人可以参与投票,但那也仅仅限于白种男人,女人和少数民族仍没有投票权利。后来,妇女和黑人又相继获得选举权,从财产拥有者的共和体制彻底走向了所有成年人都有选举权的大众民主。

今天,在那些为数不多的最近投票的选民来说,他们不是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利,而且在理念上、经济上,他们认定选举与自己有极大关系,这其实就回到了美国建国时期“社会中有份额”选民的概念了。毋庸置疑,真正平等的民主制度不允许因为社会短期的利益去剥夺一部分人的投票权利。但更重要的是,应该弄清楚,没有选举的权利与不使用选举的权利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在今天的美国,许多选民出于种种考虑选择主动不投票,但如果要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利,他们一定会拿宪法起来抗争。还有,许多选民是因为满足于现状,他们自愿放弃投票权利,也同样过着正常甚至幸福的生活,如果他们真的觉得权利受到侵犯、生活出现大的麻烦,他们会毅然用选举的权利去促使改变的。那就是为什么在某些选举中,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非常高的投票率的原因。比如,去年的法国大选就以高投票率选出了要大胆改革的萨科齐。

因此,不能把低投票率看作是对于大众民主的否定。